

# 十七世紀初西方國家在日本的對弈 ——英荷對西葡的挑戰

肖飛燕

**[摘要]** 近代早期，歐洲殖民勢力逐漸擴展至世界各地，亞歐大陸另一極的日本也成為了列國爭奪的目標。隨着 17 世紀初荷蘭和英國的紛至沓來，從戰國紛爭中漸趨統一的日本又進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老牌殖民帝國與荷蘭和英國的新興之邦的激烈角逐中。四國兩派在日本的爭奪構成了新老勢力全球爭霸的有機組成部分。英荷以後來者的身份通過商業競爭、軍事攻伐、政治宗教對抗等手段，挑戰和打擊西葡在日的壟斷勢力，最終取而代之。此外，在雙方的競爭中，德川幕府並不是處於一種被動的位置，而是積極參與甚至主導了這場新舊勢力的迭代更新，因此在其對外關係的調整中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這與 19 世紀中葉幕末時期被迫打開國門之時的被動地位截然而不同。

**[關鍵詞]** 英荷商館 平戶 耶穌會 澳門大船 德川幕府

大航海時代，歐洲大國逐一崛起。首先實現民族統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保教權”的名義下對世界一分为二、分而治之，而作為後來者的荷蘭與英國不滿西葡的全球霸權而處處發起挑戰，破壞既有秩序而欲重新塑造勢力範圍，因而形成了老牌殖民帝國與後起的新興國家之間在世界範圍的爭奪。新老兩種力量的爭奪沿着新航路的開闢從歐洲向東西兩個方向延展，而遠在東亞的日本也成為了多股勢力匯集和交鋒的戰場。雖然在 17 世紀初以英荷東印度公司為其殖民先鋒的英荷勢力在東亞勢力薄弱，然而卻也能力挽狂瀾並最終撬動了在日的西葡勢力，尤其是在日培植了半個世紀之久的葡萄牙勢力最終也被取而代之。四個歐洲國家、兩派宗教勢力、新舊商業和殖民勢力將日本變成了他們的競技場，而在日本所發生的西方國家的角逐，也可以看作是在整個東南亞地區以及之後全球範圍內老牌殖民帝國和新興國家相互競爭的縮影和集中體現。西葡逐漸日薄西山，英荷則蒸蒸日上，日本成為了這種世代更替的見證者。此外，日本在新老勢力的轉變過程中並不只是一個被動和無奈的看客，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所需推動了這種交替，西葡被驅趕出境、英國落寞離場，只有荷蘭被圈禁在了出島，對幕府馬首是瞻。“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荷蘭戰勝其他歐洲三國，獨佔日本貿易，然而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幕府才是最終的勝利者。

以往學界對於從 19 世紀中葉開始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日本的角力已是濃墨重彩，卻忽略了日歐關係初始階段的關注和研究。然而，這既是歐洲勢力在日本的第一次擴張和

作者簡介：肖飛燕，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成都 611731

在日本的第一次交鋒，也對後世日本對外關係的影響極為深重，直接導致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鎖國令”的出台，也間接對幕末被迫開國時期的外交政策有所影響。筆者旨在以 17 世紀初的日本作為舞台和背景，全面系統地論述西葡和英荷在日本存在的諸多矛盾，重點評析作為後發國家的英荷向老牌殖民帝國西葡發起的商業競爭、武力進攻、政治滲透和宗教批判等全方位的挑戰，並最終將後者排擠出日本。此外，本文進一步指出，兩派陣營的競爭態勢以及最後荷蘭成為唯一被允許留在日本的西方國家，既是四國綜合力量競爭的必然結果，也是德川幕府積極推動的結局。幕府初創時期在對外關係上的積極作為和先發制人，與兩個多世紀之後幕末時期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的被動局面截然不同。雖然前者走向閉鎖，後者邁入開放，但一種是主動為之，另一種則是被動就範，日本所處的歷史語境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 一、雙方在日本的商業競爭

1542 年葡萄牙商船漂流到種子島，先後在九州島上的多個港口經營着來船貿易，並在 1570 年正式入駐長崎之後開通了長崎—澳門的大船貿易航線，發展成為葡日之間較為穩定和持久的大宗貿易，然而正是其對日本貿易的長久壟斷地位限制了自身日後的良性發展。其經營和運作的方式顯示出低效、消極和被動的態勢，被葡萄牙商人掌控的日本市場也充斥着各種欺騙和敲詐的不公行為，而與傳教事業緊緊捆綁在一起的對日貿易，也因為日本的禁教政策而被管制，直至最後被摒棄驅逐。另一方面，雖然在 16 世紀末西班牙與日本建立了時斷時續的貿易聯繫，然而雙方之間欠缺互補性使得西日貿易只是一種邊緣性的存在。西班牙擁有盛產白銀的美洲，對與日通商的興趣和熱情並不那麼濃厚，更多是將從中國獲取的以生絲或者絲織品為主的商品運往美洲銷售，而無力持續供給多餘的絲品給日本市場，再加上西班牙運入日本的“這些商品（歐洲的織物類商品）是無法戰勝中國產的生絲、綢緞織物的”，<sup>①</sup>“（日西）貿易被允許維持下去僅僅是為了取悅於德川家康，使得他能包容在日傳教的僧侶們”，<sup>②</sup>這就使得西班牙商人在日拓殖的熱情可謂是歐洲四國當中最底的。然而，隨着新世紀的來臨，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分別在 1609 年和 1613 年派船來航日本，都在九州島西北部的平戶建立了常駐商館。更具進取性、開拓性和競爭性的英荷加速動搖了葡萄牙商業壟斷的地位，也使得西班牙在日商業勢力進一步邊緣化。

首先，在商業模式上，葡萄牙的在日貿易並沒有在運輸和銷售等環節上形成一個一體化的組織架構，西班牙更是不定期才來航日本，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而英荷東印度公司則各自建立了在日的常駐商館，與定期來日航船共同組成有機體，以持續經營其對日貿易。一方面，澳門—長崎的大船船長是按照一個“航海單位”來指認的，每年來日的

<sup>①</sup>（日）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頁 138。

<sup>②</sup>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301.

澳門大船都有可能是由不同船長指揮和掌控，由葡王親授資格或投注資金購買資格，因此，在船長的選擇上有一種隨意性，而整體安排上也缺乏一種連續性，以至於整個葡萄牙的對日貿易缺乏一種組織性。此外，葡萄牙商人沒有在長崎設置商館，交易的發生時間也就是澳門大船來航和停靠時間，“夏天渡航而來、從秋天到次年春天返航之間在長崎停泊的期間，商品抑或售盡，抑或帶着未銷售出去的部分產品返航，或者採取下次又攜帶着曾經的商品延長在長崎停泊時間的持久戰”。<sup>①</sup>1617年葡船船長向德川秀忠申請在長崎建立一個倉庫用以存放未能及時銷售的商品，卻由於擔心倉庫內會藏匿傳教士而被駁回。<sup>②</sup>此前無心常駐此地，之後又遭到德川幕府的否決，正是這種主觀與客觀雙重交織的原因，葡萄牙商人無法長期停留在日本進行商業活動、處理後續事宜和建立人際關係等。這種來船貿易類似於延長的集市活動，到港的澳門大船吸引了來自於日本各地的商人，因此他們的商業模式就是隨船而來也隨船而去。葡人的大船貿易猶如一種“賭博式”貿易，追求的是船隻的體量大而能一次性運載盡可能多的財和物，並無意培養一種在日本具有可持續性和連貫性的貿易聯繫。<sup>③</sup>而中國絲在美洲的風行使得馬尼拉的西班牙當局的經營重心一直放在美洲市場而非日本，因此，無論是相對於此前的葡萄牙還是之後的英荷，西班牙對日貿易只是一種無足輕重的存在，靠近江戶的蒲賀港後來也只是作為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大帆船貿易的一個中轉站而被西班牙所重視。整體而言，對西日貿易並不上心的西班牙自建交以來也只是間斷性地從馬尼拉派船前往日本，反倒是日本人自己駕駛的朱印船忙碌地在這條日本—馬尼拉航線之上，甚至是通過葡萄牙或者荷蘭商船銷往日本，而由中國商船在馬尼拉販賣的大部分絲綢等被載上大帆船運往萬里之外的西屬美洲。<sup>④</sup>另一方面，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分別在1609年和1613年派船來航日本之後就選址建立商館作為在日貿易的常駐機構，這不僅充分展現了英荷東印度公司對日貿易的熱誠遠遠高於西班牙，而且從實際操作層面也比葡萄牙的來船貿易更能體現一種長久性、穩定性和正規性。此外，平戶商館還只是第一步，他們並不是在平戶一地被動地等待日本商人、大名或者幕府代表前來洽談和採購，而是在前期日本政治環境友善的時候已向日本其他地區派遣商務專員，主動走出去把貿易的輻射網絡盡可能地擴大至日本各地。在1616年幕府頒佈《禁止國內自由商業令》之前，荷蘭除了在平戶的大本營之外，也在長崎、大阪、京都、堺、駿府、蒲賀以及江戶等地分別設置了分館，不斷拓殖其在日本的商業版圖。<sup>⑤</sup>英國人在到達日本短短的三年之內就構築出由平戶商館本部、江戶和大阪分館，以及直轄於平戶總館的長崎和對馬的代理

<sup>①</sup>（日）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頁93。

<sup>②</sup>張蘭星：〈論17世紀日葡貿易衰落的原因〉，《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成都），第5期（2017），頁169。

<sup>③</sup>張蘭星：〈初探16—17世紀澳門—長崎航線的葡萄牙巨船〉，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編：《絲路的延伸：亞洲海洋歷史與文化》，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209。

<sup>④</sup>張蘭星：〈論近代早期西班牙的對日通商嘗試〉，《海洋史研究》（北京），第1期（2018），頁164；范金民：〈16—19世紀前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棉布貿易〉，《江海學刊》（南京），第5期（2018），頁179。

<sup>⑤</sup>張蘭星：〈論17世紀前期日荷貿易及其成功原因〉，《史學集刊》（長春），第5期（2014），頁84。

點，這和直屬於江戶分館的駿河、蒲賀、三崎和大幾四家代理店，以及直屬於大阪分館的京都、伏見、堺、大津和靱津店，形成了在日的平戶總部、兩家分館和十一家代理店的貿易網絡。<sup>①</sup>相比之下，“來日的葡萄牙商人並不考慮長久的計策，換句話說，他們對於商業只是熱衷於眼前的利益，而並不關心其他的一切……因此，他們在來日的百年間在商業的組織架構上沒有絲毫的進步”。<sup>②</sup>作為後來者，新教國家則是全面地積極拓殖着其在日的地盤，以動搖並趕超雖根深葉茂但是卻停滯不前的葡萄牙在日勢力。

其次，在商業精神和態度上，經營着來船貿易的葡萄牙商人所展現出來的那種“消極性”和“惰性”，與英荷常駐商員願意和嘗試融入當地社會的努力形成了鮮明對照。一方面，大部分來航葡萄牙商人並沒有利用在日停留的時間積極去接觸日本社會、學習日本語言、瞭解日本文化。葡船時常是在 6 月至 9 月借着從南朝北吹的季風來到日本，然後在 10 月到 11 月間又乘着季風往南駛離日本港口，期間在日本停留數月之久，而有時候甚至是從夏季的 6、7 月份停留到次年的 1、2 月份，一年有長達三分之二的時間是留在長崎的。然而，正如耶穌會會士弗洛伊斯（Fróis）早期的記錄以及後來遠東視察員神父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o）在其信函中所述，就可見一斑，“把商貨運至日本交易的葡萄牙人，其中的大部分是不會前往當時船隻抵達的肥前國諸港之外的別的地方去看一看的”（1586），葡商來到日本就“只是進行買賣，然後回國”（1592），“基本不會出港的葡萄牙人對於（日本）不可能有廣博的認識”（1601）。<sup>③</sup>這些消極的葡萄牙商人在日停留長至七八月之久，卻只是“揮霍無度，支出達 25 萬至 30 萬銀兩，日本百姓從中得到不少好處，這是日本百姓對他們始終友好的原因之一”。<sup>④</sup>而且“即便同一個代理商來日多次，在日本進行交易的時候，在語言、商業習慣、商品行情等不通的場合也是經常出現的”，<sup>⑤</sup>所以他們更傾向於利用日本本地人和耶穌會神父來作為仲介幫助他們完成交易。然而另一方面，相對於葡商的惰性以及西班牙人的漫不經心，英荷東印度公司則在努力地耕耘着這片新開闢的市場，不僅分別設置常駐商館且前期還在日本各主要市場建立站點，使商館的商務代表們能長時間地待在日本並深入到日本社會當中。例如，作為德川家康翻譯和通商顧問的亞當斯（William Adams）<sup>⑥</sup>在日二十年已然“日本化”（a naturalised Japanner），<sup>⑦</sup>得到了德川家康青睞的他不僅被授予武士佩刀的特權，並且被封賞了在三浦郡的領地，還被賜予了日本

<sup>①</sup>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博士論文，吉林大學，2018 年，頁 76。

<sup>②</sup>（日）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六甲書房，1974 年，頁 703。

<sup>③</sup>Fróis, Luís, *Primeira Parte da Historia*; Valignano, Alessandro, *Sumario*; Valignano, Alessandro, *Del Principio y Progreso*. 轉引自（日）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六甲書房，1974 年，頁 702。

<sup>④</sup>（法）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顧良譯；施康強校：《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換》，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481。

<sup>⑤</sup>（日）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頁 93。

<sup>⑥</sup>亞當斯作為荷蘭商船“利夫德”號（De Liefde）的領航員在 1600 年隨船漂流至豐後國的白杵，成為了歷史上有史可證的第一位來日的英國人。

<sup>⑦</sup>Saris, John. *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Edited by Ernest M. Satow. London: Printed for Hakluyt Society, 1900, p.109.

姓氏“三浦按針”，最終長眠於此地。<sup>①</sup>考克斯(Richard Cocks)從英船“克羅夫”號(*Clove*)首航來日到英國商館最終撤離日本的十年間都擔任着駐日英國商館的館長一職，被評價為“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s)；<sup>②</sup>荷蘭商館館長雅克·斯佩克斯(Jacques Specx)兩度出任商館館長一職(1609年8月22日至1612年12月24日、1614年8月至1621年12月)長達十年以上；<sup>③</sup>荷蘭商館第八任館長卡隆(François Caron)更是在日本從幫廚開始到成為翻譯再到商員進而晉升為館長，在日甚至長達二十二年之久(1619—1641)等等。<sup>④</sup>他們都在身處日本的漫長歲月中去適應本土文化，這種適應體現在了服飾、飲食、禮儀、房屋的建築風格以及語言習得等各方面。尤其是英國商館館長考克斯努力地去“讀懂他日本朋友們、訪客、潛在贊助者和客人們的喜好”，<sup>⑤</sup>投其所好地見機行事，以維護好與日本社會各方的關係，從而“通過適應當地的風俗來實現他自己的(考克斯)和公司的商業目標”。<sup>⑥</sup>考克斯嘗試去認識和理解日本文化、適應和融入日本社會的努力，在學者法林頓(Anthony Farrington)心中塑造了一個“共情者”的形象(essentially sympathetic)，<sup>⑦</sup>也使得學者蓋姆斯(Games)評價他是充滿“魅力的”(charming)且具有“變色龍特質”(chameleon quality)，在考克斯的身上彰顯了蓋姆斯所謂的“世界主義”的特點。17世紀初，在與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兩個老牌殖民帝國的競爭中，正是意識到自己國家的弱勢地位以及幕府的強勢權威，這些作為新教國家代表的海外商人們力求暫時忍讓、避開鋒芒，以柔軟的姿態而非強硬的態度來面對所在國的習俗和文化。畢竟，在異域他鄉，商業上的目標並不能僅僅依靠經濟的手段和遵循商業的規則而得以實現的，更何況，處在前現代的日本社會還並沒有行之有效的商業法度，商業的操作、貿易的運行和經濟的發展都被各方勢力所滲入和浸淫，進一步被羅織到了一張無限延伸且無所不包的社會網絡當中，不能被單獨抽離出來。只有在這樣的社會當中遊刃有餘、左右逢源，商業才能隨之蒸蒸日上。

再者，在商業與宗教的關係方面，最初西葡商人與傳教士們因為彼此的需要而聯手合作共同進退，但是最終前者被後者所累而遭到幕府驅逐；然而，看似形單影隻“只經商、不傳教”的英荷商人儘管在最初沒有那些深諳日本社會的傳教士的助力，但是也使其逃脫了“商教一體”最後的悲慘宿命。作為葡商們的精神導師亦是合作夥伴的傳教士們，他們的足跡“踏至半個以上的日本國土，精通日本的國內情況，留下了種種的業績，頻繁地傳送報告……在耶穌會士當中立足於信仰，有着強烈的熱情和堅強的意志，勤勉地勞作，並

<sup>①</sup> Rundall, Thomas, editor.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6.

<sup>②</sup> Clulow, Adam. “Commemorating Failure: The Four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England’s Trading Outpost in Japan.”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68, no. 2, 2013, p. 214.

<sup>③</sup> (日) 外山幹夫：《松浦氏と平戸貿易》，東京：国書刊行会，1987年，頁163。

<sup>④</sup>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台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2000年，頁30。

<sup>⑤</sup> Games, Alice. *The Web of Empire: English Cosmopolitans in an Age of Expansion 1560-16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8.

<sup>⑥</sup> Games, Alice. *The Web of Empire: English Cosmopolitans in an Age of Expansion 1560-16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5.

<sup>⑦</sup> Farrington, Anthony.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I. The British Library, 1991, p. 1551.

富有教養的人非常多”。<sup>①</sup>學者岡本良知認為正是由於這些在素質、德行以及學識上都遠遠高於同國商人的傳教士們的幫助和支持，由他們作為中間人來斡旋在日的商業事務，從而保證了商人們在日的經營能夠順暢並且形成了壟斷之勢，造就了一種商教一體的商業模式。但是，建築在商教一體模式上的西葡商業必然存在着一個致命的軟肋，對於傳教士的依賴最終使得葡萄牙的大船貿易和西班牙的大帆船貿易引火焚身。日本禁教趨勢越發嚴峻，從 1587 年豐臣秀吉的《伴天連追放令》到 1597 年的“二十六聖人殉教”事件，再到德川家康 1614 年的全國禁教令，進而到德川秀忠頒佈的“元和禁教令”，然後升級到 1633 年到 1639 年相繼頒佈的五道“鎖國令”，西葡的商業勢力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打擊。先是 1624 年西班牙商人，接着是 1639 年葡萄牙商人先後被驅除出日本。另一方面，單槍匹馬的英荷商人從一開始自力更生，並且傾向於借助本土日本人之力來拓殖和料理其商業網絡，儘管由於文化的差異而在所難免地產生摩擦，但是這種倚賴日本人而非其本國精神導師的不便和不利卻最後使其逃脫一劫。由於在日商務人員有限，英國商館分佈各地的代理店的經營模式基本上是由英人監督並由當地日人來實際料理的日英合作模式。例如，奇特屋七兵衛經營駿河店、萬屋清左衛門打理蒲賀店、名村八左衛門管理三崎店、高津與治兵衛料理大幾店、伊丹屋孫左衛門經營京都店、末吉孫左衛門運營伏見店、平野屋藤左衛門打點堺的代理點、高島屋儀兵衛運作大津店、白橋與三兵衛照料軀津店。<sup>②</sup>此外，江戶和大阪也是由常駐的日本籍店主進行日常打理，江戶的代理店店主曾一度是亞當斯日本妻子的父親馬込勘解由，而大阪的店主則是叫作クエモン（Cuemon Dono）的日本人。<sup>③</sup>在 1616 年德川秀忠命令所有西人退至平戶和長崎兩地而不得涉足日本別處之時，“鑑於將來可能面對的嚴峻貿易形勢”，考克斯致信各店主，“希望提供全力幫助”。<sup>④</sup>正是這些日籍店主在暗地裏幫助商館渡過難關，他們會根據實際情況親自或者派人前往平戶商館提取所需之商品。<sup>⑤</sup>不僅如此，對於商館運作極為重要的角色就是日本“通詞”（即翻譯），他們名諱經常出現在各種記錄當中，<sup>⑥</sup>反映了譯員和英國人之間緊密的關係，由於他們的語言能力可以和僱主更好地溝通，使之成為了商員的直接僕從。隨侍左右的翻譯們作為英國人和日本社會之間的媒介作用不僅僅反映在英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覲見平戶領主松浦鎮信和隆信、拜謁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和秀忠、結交日本社會當中的名流要人達官顯貴以及與日本商人談判洽談等重要場合中，他們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商館的成敗。這樣一群日本籍店主和翻譯們對英國商人而言，就如同跟隨西葡商人而來的傳

<sup>①</sup>（日）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六甲書房，1974 年，頁 703。

<sup>②</sup>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博士論文，吉林大學，2018 年，頁 75。

<sup>③</sup>（日）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 400 年》，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 年，頁 27—28。

<sup>④</sup>Farrington, Anthony.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 The British Library, 1991, p. 495.

<sup>⑤</sup>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博士論文，吉林大學，2018 年，頁 90。

<sup>⑥</sup>學者詹姆斯·路易斯（James Lewis）通過梳理平戶的史料整理出先後有多位日人在商館當中從事翻譯一職，如日本的約翰（John Japan）、湯姆（Tome）、約翰（Coe John）、米格爾（Miguel）、小湯姆（Little Tome）、戈雷薩諾（John Gorezano）、曼喬（Mancho）、馬丁（Martin）、西蒙（Simon）、莫雷（John Morey）。見 Lewis, James. “Nifon Catange or Japon Fa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2003,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PhD Dissertation, p. 165.

教士們，儘管前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比後者那般親密，但是後者之間畢竟存在世俗利益和精神追求之間的分歧，這必然使他們產生種種齟齬。此外，更為重要的是在日本越發保守的宏觀情勢之下，“財神”與“上帝”的聯手必然遭致魚死網破、唇亡齒寒的悲劇。

## 二、雙方在日本的武力較量

“歐洲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善於駕馭存在於本土社會當中的各種衝突和分裂，並且能得到當地人的幫助”，<sup>①</sup>在日本國內，雖然西葡與英荷雙方並不能直接廝殺，但是他們同樣可以借由日本內部利益集團的原有矛盾來間接發起進攻。1600年的關原之戰，德川家康一舉打敗豐臣集團而鑄就了德川家不可動搖的壟斷勢力，奠定了日本的統一局面。其中有一點不能完全忽略，就是家康使用了從荷蘭船隻“利夫德”號（*De Liefde*）上沒收而來的大炮，<sup>②</sup>而他的對手石田三成從葡萄牙那裏同樣獲得了大炮數門。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使用了十二門大炮，五百發炮彈，五百個鏈球和五百把火槍”，<sup>③</sup>這裏面就有來自於荷蘭船隻上的武器。船上唯一的英國人亞當斯被命令指導家康的家臣學習使用這些火器，而且亞當斯本人很可能親自參與了這一場在日本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戰役。亞當斯當時“是受本多正純的管理，置身於日本的服從和效忠領主的體制之下，而本多正純和他的家臣在這場戰役當中發揮了首要作用，因此之後也被家康所慷慨褒獎……對於這樣一場重要戰役，合理的推測是家康不會冒險讓他新受訓的槍手單獨作戰，尤其是在亞當斯是可以對他們進行指導和監督的情況之下”。<sup>④</sup>學者羅傑斯（Hiromi T. Rogers）因而推測到，無論亞當斯是否真有親自參加到關原之戰當中，但是他以及其他荷蘭船員對於日本武士的作戰指導是不能否認的。更為明顯的是1614和1615年的大阪夏之陣和冬之陣當中，已經來航的英國也為幕府提供了重要的武器和火藥支持，幕府方面使用了英國製造的大炮和彈藥。大阪冬之陣此前的數月，德川家康就通過亞當斯向剛剛建立不久的英國商館購買了“五門大炮、火藥和鉛塊”等軍事武器和相關物資，<sup>⑤</sup>並誇讚英國大炮的威力勝過十門土製大炮。<sup>⑥</sup>“這次（豐臣集團的）潰敗主要是因為英國人銷售給（德川家康）的火藥和鉛彈，而且公司的記錄當中流露出他們因為金庫充實而欣喜不已”。<sup>⑦</sup>這兩次日本內戰雙

<sup>①</sup> Scammell, G. V. “Indigenous Assistan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ortuguese Power in A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4, no. 1, 1980, pp. 1-2.

<sup>②</sup> 1600年一艘衝破了西班牙的重重阻擾、跨越過整個太平洋的荷蘭商船“利夫德”號（*De Liefde*）在1600年漂流至豐後國的白杵。九年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帶箭的紅獅”號（*Leeuw Met Pijlen*）和“格里芬”號（*Griffioen*）來航日本，正式與日本建立通商關係。

<sup>③</sup> Rogers, Hiromi T. *Anjin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amurai William Adams, 1564-1620: As Seen Through Japanese Eyes*. Renaissance Books, 2016, p. 17.

<sup>④</sup> Rogers, Hiromi T. *Anjin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amurai William Adams, 1564-1620: As Seen Through Japanese Eyes*. Renaissance Books, 2016, p. 17.

<sup>⑤</sup> （日）宮永孝：《日本とイギリス——日英交流の400年》，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頁29。

<sup>⑥</sup> Screech, Timo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vol. 24, 2012, p. 16.

<sup>⑦</sup> Screech, Timon. “‘Pictures (the Most Part Bawdy)’: The Anglo-Japanese Painting Trade in the Early 1600s.” *The Art Bulletin*, vol. 87, no. 1, 2005, p. 50.

方背後都有了外國勢力的支持，站在幕府身後的英荷也是瞄準了豐臣集團背後以傳教士為代表的西葡勢力。同樣，之後在 1637 至 1638 年的島原之亂中，荷蘭商館館長庫克巴克爾（Couckebacker）積極協助幕府鎮壓島原、天草一帶的農民起義。在幕府軍隊的指揮官板倉重昌的要求下，荷蘭商館配合平戶藩主松浦鎮信（天祥）派船隻“雷普”號（*De Ryp*）運載大炮和火藥，從平戶開往原城附近的海域，從船上不斷炮轟困守在原城當中的起義軍，“大概在十日之內，共發射了 425 發炮彈攻擊……（板倉重昌陣亡之後新任的指揮官幕府‘老中’）松平信綱等對於（荷蘭人）的忠勤表示滿意”。<sup>①</sup>這次起義一方面是島原和天草的農民由於受到從 1634 年以來的連年災荒和兩地領主松倉重政和寺澤廣高的苛政盤剝而被迫起兵造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宗教因素所起到的催化作用。由於這兩個地方曾經是有馬晴信和小西行長兩位基督教大名的領地，存在着大量的基督徒。即便在傳教士基本無法生存的 1637 年，這些年年被幕府要求“踏繪”但依舊懷揣着天主信仰的日本民眾（“隠れ切支丹”）有可能會成為西葡傳教事業死灰復燃的基礎。因此，對於西葡的擔憂，成為了荷蘭和幕府共同的恐懼，荷蘭主動請纓和幕府聯手共同鏟除他們心中的芒刺。總體而言，在日本國內的武力對決中，英荷和西葡通過謀略的策劃、彈藥的供給、甚至直接參與到戰役當中，在為日本內部對抗勢力服務的同時，其實也是一種相互對抗，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以日本人的血與肉來達到戰勝和消滅彼此的目的。

日本內部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對峙為外來勢力提供了對決和廝殺的戰場，然而英荷的“商武一體”更體現在兩國在貨源地和航路上與西葡的直接交鋒和對壘之上。正如 1618 年升任荷蘭東印度總督的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所宣揚的戰爭與貿易不可分離，“我們不能從事沒有戰爭的貿易，也不能進行沒有貿易的戰爭”，兩者熔鑄為一體。<sup>②</sup>英國東印度公司東南亞的總部萬丹（Bantam）商館主席喬治·波爾（George Ball）面對平戶商館的不佳運營狀況，提出了三個加以整治的方式，除了模仿荷蘭人的經營方式、拋棄日本商館館長考克斯期望借由中國人（李旦和華宇等）作為媒介來鋪設通往中國之路的不切實際的天真想法之外，他格外強調了可以讓在日商館盈利的方式就是海盜活動。<sup>③</sup>而這就使得英荷與西葡之間所謂的商業對抗更為激烈，甚至血腥和殘酷，武裝進攻、殺人截貨、放火燒船的對抗則是赤裸裸的鐵血政策和炮艦策略。澳門大船尤其是超過 400 噸的大船成為了英荷的重要打擊目標，<sup>④</sup>因此在獲悉英荷船隊的動向之後，葡商會選擇盡量迴避甚至終止航行，“澳門大船的舵手看見荷蘭船隻出沒，就立即返航長崎，以免遭到荷蘭人的攻擊”，<sup>⑤</sup>“當葡船發現我們（英國人）後，像受驚的蝴蝶一般，四處逃散”。<sup>⑥</sup>為了躲避英

<sup>①</sup>（日）外山幹夫：《松浦氏と平戸貿易》，東京：国書刊行会，1987年，頁181。

<sup>②</sup>Farrington, Anthony.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vol. II, The British Library, 1991, p.1552.

<sup>③</sup>Markley, Robert.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7.

<sup>④</sup>Scammell, Geoffrey Vaughn. *Ships, Oceans, and Empire: Studies in European Maritime and Colonial History, 1400-1750*. Variorum, 1995, p. 122.

<sup>⑤</sup>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p. 5.

<sup>⑥</sup>Boxer, C. 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96.



荷船隻的攻擊，葡人在 1618 年之後還不得不放棄傳統使用的大船而選擇了由輕便的小船組成的船隊，以便能在遭遇襲擊的時候快速脫身而保全財物，從而主動放棄了制海權，被荷人恥笑為“懦夫邦”。<sup>①</sup>一方面葡王或者果阿總督無力承擔在遠東維繫一支強有力的海軍艦隊的費用，而且澳門與馬尼拉的分歧使得西葡在軍事上的合作無法開展，而澳門葡商又總是違背國王的命令而採取了消極抵抗甚至是不抵抗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1619 年英荷為了共同利益而組建的英荷東印度公司防衛同盟（the Union of the English and Dutch Companies），其中就規定兩國以平戶為基地之一組建一支由十艘船組成的聯合防衛艦隊（Fleet of Defense）來阻截和襲擊西葡的船隻。聯合艦隊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通過阻止來自於澳門和呂宋的西葡船隻，從而達到封鎖他們分佈在東南亞一帶的殖民港口與日本的聯繫，阻斷商品流入到日本。對於往返於日本和菲律賓的中國船隻也是主動出擊，加以劫持，“（如果）中國商船前往菲律賓，或者由菲律賓前來日本，在途中一旦發現就予以捕獲，從而使得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能夠轉移至英荷兩國的基地……平戶一時之間成為英荷聯合艦隊的根據地，另一個則是巴達維亞”。<sup>②</sup>

英荷兩國對於澳門的騷擾和軍事進攻，目的也是一樣，他們策劃着將葡萄牙人驅趕出澳門，從而取而代之，一旦掌握澳門—長崎之間的貿易，葡萄牙在日本的時日也就屈指可數了。考克斯盤算着以英荷聯合防衛艦隊可以輕而易舉拿下澳門，鑑於澳門這座城市並無有效的防衛，因明朝政府多次干預和拆毀了葡萄牙人建築的城牆，以防其有變心。面對這樣一座暴露的城市，再加之葡萄牙的艦隊的戰鬥能力低下，考克斯認為“只要兩艘像‘公牛號’（*Bull*）、‘胡椒號’（*Peppercorn*）這樣的船隻，今年來到澳門，它們就可以輕易地燒掉和搶奪 17 艘停靠的葡萄牙船隻，而其中就有 6 艘是前往日本滿載貨物的船。如果他們可以拿掉葡萄牙的這支船隊，正如葡萄牙人他們自己承認的一樣，葡萄牙將會完全覆滅，並且，如果這個澳門城能被佔領的話，那麼葡萄牙在這個地區的貿易自然會被破壞，和馬尼拉、馬六甲、果阿以及其他地方的貿易也就被切斷”。<sup>③</sup>這裏的“其他地方”自然包括了日本。考克斯的戰略安排還只是一種設想，而荷蘭人卻是在 1622 年主動出擊攻打了澳門，只是後來葡萄牙的防守以及大明朝廷的協助，使得荷蘭的計謀也未能得逞。荷蘭之後一度盤踞在台灣，控制了重要的台灣海峽。雖然存在着與明清朝廷以及與鄭氏集團等海商或者海盜集團之間錯綜複雜的合縱連橫等既合作又競爭關係的制約，荷蘭東印度公司此後以台灣為重要據點，“這裏迅速成為荷蘭與中國、日本、菲律賓、暹羅、柬埔寨等地開展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在對日貿易當中，荷蘭人終於搶到了一個類似於葡據澳門的據點”。<sup>④</sup>正是這種刀光劍影的武力對抗行為，使得英荷獲得了運往日本的大量商品，從而彌補了正

<sup>①</sup>張蘭星：〈初探 16—17 世紀澳門—長崎航線的葡萄牙巨船〉，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編：《絲路的延伸：亞洲海洋歷史與文化》，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209。

<sup>②</sup>（日）武藤長藏：《日英交通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78 年，頁 47—48。

<sup>③</sup>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326.

<sup>④</sup>張蘭星：〈論 17 世紀前期日荷貿易及其成功原因〉，《史學集刊》（長春），第 5 期（2014），頁 87。

常商業管道的供貨不足，以此穩固他們在日本的基礎，進而構成對於在日西葡勢力的有效威脅。

此外，英荷還企圖借助日本之手或者與日本聯手向西葡在亞洲的據點發起武裝進攻，期望能削弱甚至剷除後者在亞洲的存在，從而確保前者在這一區域包括在日本的穩定發展。在這一方面，更具有征服欲的西班牙人成為了日本最高統治者心中的芒刺。從豐臣秀吉時期，日本人對於盤踞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就已然有所憂心，1592年曾派使臣威脅道：“若不及早前來（在豐臣秀吉）面前跪地匍匐表達敬意的話，則會直接下令將你們殲滅，之後再後悔也無濟於事。”<sup>①</sup>1596年抵日的西船“聖·菲利普”號（*Sen Felipe*）船長肆無忌憚地揚言聖方濟各會的傳教士是西班牙攻伐日本的先鋒，更是激怒了本已不安的豐臣秀吉，而直接導致了1597年的“二十六聖人的殉難”；之後哪怕是致力於促成日西貿易的德川家康也不得不顧忌英國人亞當斯的諫言，允許他國對自己海岸的測繪是西方國家所不能允許的，這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西班牙人的此番請求無異於“為其侵略日本在做準備”；<sup>②</sup>再加上，西班牙人在1624年至1642年之間在台灣北部的活動也始終使德川幕府憂心與不安。當英國通航日本之後，英國商館館長考克斯曾提議德川幕府出兵攻擊盤踞在菲律賓的西班牙部隊。雖然這項提議被德川秀忠否決了，但是給出的原因主要是考慮到曾經的朝鮮戰爭曠日持久使得日本人存在着一種“厭戰情緒”，而且建立並不久的德川幕府也缺乏對於遠程遙控在外部將臣屬的信心。在17世紀30年代，荷蘭人又再次煽動幕府對菲律賓的西班牙勢力以及澳門的葡萄牙人進行肅清，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困擾日本已久的基督教問題，並徹底打破附着其上的來自於西葡的殖民企圖。在1635—1636年的幕府內閣會議當中，荷蘭的獻言和建議被反覆磋商和研究過，甚至在一次會議當中以“三票支持和兩票反對的結果通過表示予以支持”，認為一萬人左右的武士再外加荷蘭船艦的配合和支持完全可以戰勝馬尼拉當地人數並不多、“報酬低廉、給養不足且半飢餓”的西班牙戍衛部隊。<sup>③</sup>躊躇良久的德川家光最終改變了其對於日本域外他國紛爭持有的不予介入、無所作為的態度，而在1637年底接受了進攻菲律賓呂宋島的計劃，“或者是由於受到耶穌會馬斯特里利神父（Marcello Mastrilli）以及那一年來自於馬尼拉的其他神父潛入日本的緣故”。<sup>④</sup>當時在平戶的荷蘭商館館長庫克巴克爾（Nicholas Coukebacker）在當年的十一月正式得到幕府方面的通知，要求其提供幫助，配合幕府完成此次向馬尼拉派兵的軍事行動，“荷蘭人答應並許諾四艘大船和兩隻快船將日本軍隊運送至目的地”。<sup>⑤</sup>然而，當此次軍事部署正在進行當中的時候，1637年12月天草的農民起義爆發了並很快擴展至島原

<sup>①</sup>Boxer, C. R. *Portuguese Merchant and Missionaries in Feudal Japan 1543-1640*. Variorum Reprints, 1986, p. 8; (日)村上直次郎譯註：《異國往復書翰集》，東京：雄松堂，2005年，頁30。

<sup>②</sup>Bauer, Susan Wise. *The Story of the World: History for the Classical Child (Volume III): Early Modern Times*. Peace Hill Press, 2004, p. 63.

<sup>③</sup>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373.

<sup>④</sup>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373.

<sup>⑤</sup>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374.

半島，而後從“島原起義”當中緩過神來的幕府並沒有再繼續實施向外的軍事打擊而是反向行之，決定緊鎖國門，斷絕日本人與西葡的一切聯繫。德川幕府曾願意考慮進行這種在日本疆土之外針對西葡的軍事攻伐的根本原因，在於西葡對於日本的經濟、宗教、政治的滲透，使得日本有可能成為他們在亞洲的又一個殖民據點；這種擔憂和惶恐則進一步在英荷的遊說或者煽風點火之下變得越發強烈，讓統治者越發坐立不安。其實，早在161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獲得幕府的默許之下以合約的形式大量徵募日本人作為僱傭兵，並將其派遣至東印度群島參與到當地的戍衛和對西葡的戰鬥中——日本人被看作是“尤其尚武的民族”、“是這個地區當中最具有戰鬥性的民族”<sup>①</sup>——之後，英荷又鼓動日本打擊西葡亞洲勢力的獻言和計策是在洞察了幕府的憂懼而順勢為之。對於英荷而言，日本幕府的海外派兵可以為英荷一直以來針對西葡在東南亞一帶的據點和船隻的軍事打擊再助一臂之力，可以形成日本與英荷之間的軍事聯盟。

後來，在幕府決議斷絕與西葡的任何往來而準備依賴荷蘭作為日本和外界的唯一重要聯繫的時候，正是荷蘭強大的海上軍事實力讓幕府覺得它是替代葡萄牙的不二人選，能免受或者壓制西葡的武力攻擊而順暢地開展對日貿易。荷蘭艦隊馳騁於世界的各海域對於老牌殖民帝國西葡構成了致命的威脅，無論是狙擊西葡的船隻還是封鎖他們所佔領的殖民港口，荷蘭在海上成為了西葡的“天敵”。1639年當幕府詢問如果葡萄牙被驅逐出日本之後，荷蘭是否可以扮演葡萄牙的角色運送日本所需要的絲織品等來日、荷蘭是否可以抵擋住西葡的阻擾而長期與日本通航的時候，荷蘭商館館長卡戎（François Caron）信誓旦旦地承諾並沒有問題，“我們不僅僅奪回了曾經失去的領土，而且每年我們還將他們的領地以及富庶的城池佔為己有”；<sup>②</sup>“他們非常懼怕我們，他們所有人都不敢出戰而是逃之夭夭。他們不敢造訪我們的地盤，而我們卻是年年訪問他們的海岸，由於我們的封鎖，他們一艘船都無法進出，而且也不敢從我們身旁通過。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西班牙人在海上所遭受的大部分損失都是我們施加給他們的”。<sup>③</sup>而在1580年之後淪落成西班牙附屬的葡萄牙更是逐漸無力向東方派出強大的艦隊和充足的補給來抵抗荷蘭人持續不斷的封鎖和攻擊，而逐漸失去其昔日的輝煌。<sup>④</sup>正是荷蘭在17世紀初所擁有的強大軍事實力使其一度成為了海上的霸主，驅趕、阻擾、搶奪並封鎖敵國的船隻或據點，使得西葡在東印度的勢力範圍受到嚴重侵蝕，荷蘭“商武一體”的路線也最終撼動了曾經在日本根深蒂固、枝繁葉茂的西葡勢力。

<sup>①</sup> Clulow, Adam. “‘Great Help From Japa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Experiment with Japanese Soldiers.” *The Dutch and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ies: Diplomacy, Trade and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Asia*, edited by Adam Clulow and Tristan Mostert,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96.

<sup>②</sup> (日)永積洋子：《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三輯）——自一六三三年九月至一六三七年十月》，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頁332；(日)永積洋子：《近世初期の外交》，東京：創文社，1990年，頁76。

<sup>③</sup> (日)永積洋子：《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四輯）——自一六三七年一月至一六四一年六月》，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212。

<sup>④</sup> Bruce, John. *Annals of the Honorable East-India Company: From Their Establishment by the Charter of Queen Elizabeth, 1600, to the Union of the London and English East-India Companies, 1707-8*, vol. I. London: Black, Parry and Kingsbury, 1801, p. 38.

### 三、雙方在日本的宗教活動

和之前來自日本本土佛教和神道教的攻擊一樣，“只經商、不傳教”的英國人和荷蘭人也將矛頭直指西葡神父們的傳教動機並不單純，這裏面裹脅着葡萄牙和西班牙對於日本領土的野心，妄圖顛覆日本政府統治，破壞日本的統一。起初織田信長還能以輕鬆的語氣來回應佛教僧人對於基督教的指摘，“（如果）35 個宗教派別可以被容忍和接受，那麼我們可以輕易地接受這第 36 個，讓這些陌生人們（耶穌會士）免受打擾享有平靜吧”。<sup>①</sup>而此後如燎原之勢發展的本土天主教勢力則不得不使豐臣秀吉有所畏懼，直言不諱地指責道，“傳教士狡詐……蒙騙諸多上層和貴族……若不阻止，他們將會與一向宗一樣，以說教聚眾，殺害領主奪取領地，成為大領主，再現一向宗與織田信長對抗的形式”。<sup>②</sup>在 1614 年和 1615 年的大阪冬之陣和夏之陣中，耶穌會和其他修會的神父藏匿於豐臣秀賴的城堡之中為其出謀劃策，這一切使德川家康越發懼怕基督教這一精神勢力會成為政權顛覆的世俗力量。英荷之人也附和了反天主教的輿論宣傳，從而進一步加深了幕府的不安。在綱常倫理上，他們指控傳教士們的宣教旨在“慫恿子女違背父母”，在社會秩序上，則“慫恿臣民違抗君王”，<sup>③</sup>以對天主的信仰來代替“孝”、“忠”之義，進而從根本上摧毀日本社會賴以凝聚和維繫的基石。再加上，西葡之人的佈道傳教與兩國殖民擴張之間潛在關係，即便不是“領土侵犯”，那也是“政治侵入”。<sup>④</sup>在貿易上仍屈居下風的荷蘭人善於在日引導風向，“宣揚對於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利的言論，耶穌會傳教士們力圖讓所有的日本人都皈依天主教，以此來破壞甚至顛覆日本的政權，再一次將日本捲入到紛爭的內戰浩劫當中”。<sup>⑤</sup>尤其是受德川家康青睞的英國人亞當斯則直言不諱，表示西班牙人“想要奪取日本，就像他們在秘魯或者新西班牙所做的那樣，這就是他們在這裏的真正原因”。<sup>⑥</sup>在大阪一役之後，甚囂塵上的關於豐臣秀賴仍然活着並被耶穌會士悄悄藏匿起來的傳言，使得德川家康對於耶穌會的戒心、懷疑甚至是憤怒逐步加深，耶穌會的災難自然就是英荷的機會。當豐臣秀賴的去向以及生死已經逐漸淡出公眾視線，一切趨向風平浪靜之時，又有傳言稱耶穌會士們“慫恿德川秀忠同父異母的兄弟松平忠輝（Matsudaira Tadateru）發起政變，革除幕府體制，立他自己為一個新的統治者，一個聽起來像外國的稱號‘國王’，正是詹姆斯所使用的稱謂”。<sup>⑦</sup>德川秀忠對於這個流言自然不會無動於衷、置之不理，而後將其兄弟流放到了伊勢（Ise）的淺間山（Asama）。英荷警醒日本統治者要有所防備，在日本的

<sup>①</sup> Rundall, Thomas, editor.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4.

<sup>②</sup>（日）柳谷武夫編輯：《耶穌會日本年報——1587 年年報（下）》，東京：雄松堂，1989 年，頁 232—233。

<sup>③</sup> 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163.

<sup>④</sup> Screech, Timo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vol. 24, 2012, p. 11.

<sup>⑤</sup> Jansen, Marius B.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4.

<sup>⑥</sup> Screech, Timo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vol. 24, 2012, p. 11.

<sup>⑦</sup> Screech, Timo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vol. 24, 2012, p. 30.

西葡商人、傳教士和信徒群體都有可能成為這種武裝侵略的內應和先鋒部隊，從而令日本的防衛體系在內部和外來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而瞬間崩塌和淪陷。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德川家康統治末年第一次頒佈了全國性的禁教命令，以及此後從德川秀忠開始的一連串宗教迫害政策，日本的禁教局勢在英荷來航日本之後呈現急轉直下的局勢，因此，“商教一體”的西葡實力大損。

英荷還大肆地宣傳耶穌會在歐洲總是捲入各國的宮廷政治當中，因此他們既可以為君主服務，也可能會密謀發動政變，甚至弑殺君主來變換政權；而擁護和反叛的標準就在於寶座之上的王權是否為天主教的擁立者和保護者，是否為教皇權威的服從者和皈依者，以此來提醒和警示幕府統治者。英國人在 1613 年的到來，不僅附和並加強了之前荷蘭人對於傳教士諸種野心的控訴，從而堅定了幕府控教的決心，更為重要的是英國人將其在本國與羅馬的對立、與天主教的爭奪、與耶穌會的鬥爭告知日本統治者——耶穌會在英國曾試圖毒害伊莉莎白女王的企圖，並且在議會當中埋藏炸藥意圖將詹姆斯一世炸死，雖然都沒有得逞，但是卻充分暴露了耶穌會士們企圖發起宮廷政變的野心，從而操縱英國局勢——連之後在日本的酷刑面前退縮叛教的耶穌會神父費雷拉（Ferraira）也坦言道：“教皇正全力廢除那些不是羅馬天主教的君主，例如英國的伊莉莎白女王和其他。”<sup>①</sup>因此，對於潛入到英國國內的天主教神父，一旦被英政府緝拿，就會被質詢三個問題：“一、伊莉莎白一世是不是合法的君主。二、教皇是不是有廢除異國君王、剝奪其王位的權力。三、如果天主教國家侵略英國的話，他們究竟會選擇哪一邊。”<sup>②</sup>女王要求所有的天主教神父必須服從於英國國王，否則全被遣送出境，而所有的耶穌會會士則一律全部驅逐；在詹姆斯遭遇國會炸藥陰謀之後，再次宣佈驅逐“所有受命於羅馬教廷的耶穌會士、神學院學生、托鉢僧修士以及其他神父，無論是普通神父還是世俗神父”。<sup>③</sup>英國的宗教改革擺脫了教廷以及其背後的其他國家勢力的糾纏與羈絆，建立起了以國王為首的國教，此後令出於一，確立了國王作為國家事務和宗教信仰的最高元首。通過這種與教皇決裂的方式，以及荷蘭脫離西班牙統治的獨立戰爭和英國與西班牙的戰役，使得新教國家打敗了這些 16 世紀的超級大國，從而加速了自己國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獨立發展，開始了民族和國家意識建構之路。在這裏英荷的諸種經驗，就是要告知才初登大位的德川統治者們，擺脫教皇、擺脫西葡，才能夠實現日本真正的統一、實現政治穩定，而不被這些外來勢力所滲透甚至顛覆。英國商館館長考克斯在江戶面見幕府官員的時候，也還一再警醒將軍要時刻警惕這些傳教士的一舉一動，“以防他們會向他（將軍）做出他們對英國統治者們所行之事，去暗殺和毒害他們（統治者們），或者用炸藥炸死他們，以及鼓動臣民反抗違逆他們的君主。

<sup>①</sup> Viallé, Cynthia, Leonard Blussé, trans. and eds. *The Deshima Dagregisters*, vol. 11. Intercontinent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Expansion, 2001, pp.104-105; cited from Screech, Timo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vol. 24, 2012, p. 22.

<sup>②</sup> (日)高瀬弘一郎：《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頁201。

<sup>③</sup> Screech, Timo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vol. 24, 2012, p. 26.

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傳教士們）被通通驅趕出英國”。<sup>①</sup>正如荷蘭商館館長歐沃特瓦特（Pieter Overtwater）所言，“耶穌會對於英國君主制的介入始終是日本當權者心中最大的擔憂”，<sup>②</sup>耶穌會的陰謀論和弑君論的確使得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們忌憚不已。正是英國人的這番持續不斷的輿論造勢和政治遊說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幕府禁教的步伐，“皇帝（將軍）已經將所有的耶穌會士、祭司、托鉢會士和修女驅趕出他所有的領地，一些被放逐前往菲律賓，其他則前往中國的澳門”。<sup>③</sup>傳教士們甚至“將他們遭到日本的驅逐的主要歸因於英國人”，<sup>④</sup>一度使得在日的英國人受到本土信教者的非議和敵視。德川家康 1612 年反天主教的敕令在其直屬之下的“天領”開始，“然而直到此時（1616 年）仍舊有很多教皇信徒和耶穌會士偷偷地隱匿於日本的很多地方”，<sup>⑤</sup>這迫使幕府的禁教政策從一時一地不斷升級為全國範圍內的持續性政策，並逐漸深化為根本性方針和不可觸碰的底線而被繼承到德川秀忠和家光的統治當中。不管這種叛亂是國外勢力侵入日本，還是利用國內反抗力量來對抗現有政府，或純粹的是為了上帝之名而懲罰違逆的君王，在幕府的將軍看來，這樣一種異己力量的存在都是日本社會內的毒瘤，都是他們頭上懸着的一把利劍，必然是要嚴防死守，全力鎮壓，最終驅逐流放。

不僅如此，新教國家也主動出擊助幕府一臂之力全力搜捕偷偷潛入日本的神父們，將他們交與幕府，在向幕府表忠心的同時也以這種直接針對傳教士們的方式來打擊西葡的在日勢力。最為典型的的就是 1620 年所發生的“平山常陳事件”，從馬尼拉前往日本的日本船隻遭遇到了在台灣海峽遊弋的英荷聯合艦隊中的英國船隻“伊莉莎白”號（*Elizabeth*）的中途攔截。英船的船長亞當斯（Robert Adams）在登船檢查時被告知船中窩藏着來自於馬尼拉的傳教士，於是下令對船隻進行搜查，發現了兩名偽裝成商人身份的聖奧古斯丁派神父佩德羅·祖尼加（Pedro de Sunega/Pedro de Zuñiga）和聖多明我會神父路易斯·弗洛雷斯（Luis Flores）以及馬尼拉教會對他們任命的文件。<sup>⑥</sup>英國人將這艘船連帶兩位傳教士一起拖曳回平戶港。為了獲得兩個神父的口供，荷蘭商館館長斯佩克斯和“伊莉莎白”號船長亞當斯對他們進行嚴加拷問，“讓他們赤身裸體並把其手脚捆綁住，將臉浸入水中，並對他們進行鞭打”。<sup>⑦</sup>除了提交了來自於馬尼拉教會的任命文件之外，英荷雙方都竭盡

<sup>①</sup> 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173.

<sup>②</sup> Viallé, Cynthia, Leonard Blussé, trans. and eds. *The Deshima Dagregisters*, vol. 11, pp. 104-105; cited from Screech, Tmon. “The English and the Contr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Edo Period.” *Japan Review*, vol. 24, 2012, p. 22.

<sup>③</sup> 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270.

<sup>④</sup> 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139.

<sup>⑤</sup> 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139.

<sup>⑥</sup> “馬尼拉奧古斯丁教派主教任命佩德羅·祖尼加為日本教區副監督（vicar general）的任命書和其他可以證明此事的信件”、“馬尼拉多名我教派主教任命路易斯·弗洛雷斯為日本教區副監督的書信及任命書”，見 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216；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博士論文，吉林大學，2018 年，頁 115。

<sup>⑦</sup>（日）外山幹夫：《松浦氏と平戸貿易》，東京：国書刊行会，1987 年，頁 188。

全力尋找證據和證人來坐實這兩項指控。<sup>①</sup>最後在證據、證人面前和來自於英荷的壓力之下，有心偏袒西班牙的長崎奉行長谷川藤正也只能妥協，“最後，他們（兩名西班牙人）承認了自己是傳教士”。<sup>②</sup>“祖尼加最終供認了自己的傳教士身份。隨後，弗洛雷斯也供述自身為‘光榮的聖·多明哥派傳教士’，來航日本是為重振天主教傳播事業”。<sup>③</sup>之後，1622年兩位神父和日籍船長平山常陳在長崎被處以火刑，而其他的十名船員也被斬首示眾。在整個過程中，尤其是荷蘭商館對於此事的處置使他們獲得了對幕府“阿蘭陀御忠節”的聲譽。自然這個聲譽並不是建立在荷蘭和英國人海盜式的行為基礎之上，而是由於他們積極配合幕府緝拿住了妄圖偷偷潛入日本的外籍傳教士的功勞之上。“平山常陳事件”代表着英荷將劫掠行為和對西葡傳教士的打擊結合起來，前者成為達成後者目的的一種方式，後者為前者的行為正名。

但是，與日本佛教徒和日本民族主義者對於基督教毫無忌憚的攻擊不同的是，英國和荷蘭需要非常謹慎小心地闡明自身的立場。越來越嚴峻的禁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激化了英荷在各方面針對西葡的競爭和對抗，以此來向幕府表明他們與後者之間的涇渭分明甚至勢不兩立，以至於讓日本統治者一度相信“有兩個基督的存在”。<sup>④</sup>當被幕府官員反覆質詢其宗教身份的時候，英國人主動申明他們只是聽從於上帝的召喚，而不是俯首於教皇膝下的天主教徒（papists），着力勾畫出基督教中新教和天主教的區別。“我們絕不是耶穌會士和托鉢僧人的朋友，也絕不會允許他們的團體存在於英國本土，而是會將其處死。這種政策已經在英國持續了六十年之久了。因此，將軍沒有必要害怕我們和他們教派的對話，因為他們對於我們以及我們宗教的仇恨甚至超過了任何其他人”。<sup>⑤</sup>當被要求不准與傳教士們交流、向他們告解並且被他們洗禮的時候，英館館長考克斯斬釘截鐵地回覆道：“閣下對此無需有任何的疑慮，因為這本來就不是我們國家的風俗。”<sup>⑥</sup>以此盡可能地與舊教國度劃清界限，並表明自身站在幕府身後，力主禁教措施。學者斯克里奇（Timon Screech）則進一步指出，作為一個新教國家，英國與西葡在日宗教勢力對峙中，其反羅馬教廷和反耶穌會的立場是比荷蘭更加堅定，只是英國的這種堅決中並沒有像荷蘭人在日本所表現出的那種柔軟性而無條件甚至無原則地服從幕府的命令。荷蘭人已經不僅僅是宣揚他們“只經商，不傳教”的貿易原則，也不僅僅是向日本最高統治者強調他們與伊比利亞

<sup>①</sup>在第二次平戶審判的時候，斯佩克斯尋找到兩名目擊證人出庭作證，一人是葡萄牙人拉維雷斯（Ravelles），另外一個人則是馬尼拉的人，雙方都指稱祖尼加是聖奧古斯丁會的神父。而且在第三次審訊的時候英荷方面又尋得一名重要證人托馬斯（Tomas），他是一名被關押在大村的日本籍神父，為了活命，他放棄神父身份並叛教，他在平戶藩主松浦鎮信和長崎奉行長谷川藤正面前作證，“兩名被關押在荷蘭（商館）的囚徒是神父”，見 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221.

<sup>②</sup>（日）外山幹夫：《松浦氏と平戸貿易》，東京：國書刊行會，1987年，頁188。

<sup>③</sup>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博士論文，吉林大學，2018年，頁117。

<sup>④</sup>Rundall, Thomas, editor.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XXIII.

<sup>⑤</sup>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175.

<sup>⑥</sup>Thompson, Edward Maunde, editor.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vol. II. Taylor & Francis Ltd., 2010, p. 280.

半島的天主教信仰的種種不同甚至是根本對立，“西葡之人曾經攻伐我們的城池，還將他們的教義強加在我們身上。對於不認同之人，則以極為可恥的方式實施屠戮”，然而，“（現在）他們即便想要如是做，卻再也無法做到了”。<sup>①</sup>荷蘭人還以實際行動來向幕府將軍傳達了他們“並不是基督徒”，他們可以踏繪、焚燒聖經、廢棄聖事、屠戮殺害基督教徒。耶穌會士對於荷蘭人卑躬屈膝進行了口誅筆伐，“（只有）荷蘭人通過唾棄聖母瑪利亞的繪畫和圖像，通過將聖經付之一炬，來說服民眾，他們並不是基督徒，從而允許他們繼續在那裏進行買賣”。<sup>②</sup>而在 1637 年至 1638 年的“島原之亂”當中荷蘭人的所作所為則足以表示出了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哪怕是向同為基督徒的日本信眾開火也在所不惜，協助幕府鎮壓起義甚至屠城，以此向幕府顯忠誠、表決心，從而“完美地”完成了幕府對他們的考驗。正如此後年寄松平信綱所言，“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都是基督徒，想試探一下荷蘭人是不是會（在此役中）全力以赴。荷蘭人也的確這樣做了，因此閣老們對於荷蘭人持有了特別的想法和感情”。<sup>③</sup>學者馬克利（Robert Markley）談及在 17 世紀，歐洲人在日本的存在方式，總結了四種，耶穌會士的殉教而死，或者像費雷拉選擇棄教，或者如英國人亞當斯般去適應，或者像荷蘭人那樣服從和歸順。<sup>④</sup>

#### 四、幕府推動下的雙方對弈

17 世紀初期，日本在基本結束了其國內百年的戰國風雲，而迎來統一的局面之時，由於英荷的相繼來航，卻又轉變成了他們與西葡之間新老殖民勢力之間四國兩派的格鬥場。雙方之間明爭暗鬥以玷污彼此的形象，削弱彼此的影響，排擠彼此的勢力，甚至是直接兵刃相見，企圖將對手都逐出日本。然而，從西葡到英荷，從葡萄牙的時代進入到荷蘭的時代，除了英荷對於西葡的在日勢力發起了全面挑戰，同時也得益於日本國內政策的變化，幕府也是推動這一巨大轉變的重要力量。

在英荷來航之初，德川家康就給予一系列特權從而為他們在日的經營和開拓保駕護航，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更是得到幕府的倚重，成為了後者用以制衡西葡在日勢力的利器。1600 年漂流到日本的荷蘭船隻“利夫德”號倖存船員剛登陸就陷入了葡人尤其是耶穌會士所編織的輿論漩渦，後者一再勸誡幕府要警惕被視作為“所有國家的盜賊和搶匪”的英荷之人，然而未有動搖的德川家康不偏不倚，“我們（英荷之人）並沒有對他（德川家康）以及他的領土造成任何的傷害與破壞，因此將我們處死是違背理智和正

<sup>①</sup>（日）永積洋子：《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三輯）——自一六三三年九月至一六三七年十月》，東京：岩波書店，1969 年，頁 332；（日）永積洋子：《近世初期の外交》，東京：創文社，1990 年，頁 75 - 76。

<sup>②</sup> Markley, Robert.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2-253.

<sup>③</sup>（日）永積洋子：《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四輯）——自一六三七年一月至一六四一年六月》，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頁 109；（日）永積洋子：《近世初期の外交》，東京：創文社，1990 年，頁 80。

<sup>④</sup> Markley, Robert.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55.



義的行為”。<sup>①</sup>此後，當英荷東印度公司紛紛派船前來請求締結通商關係之時，德川家康更是熱情回應，尤其是頒予英國的貿易特許狀表明了“我們（英國人）從日本皇帝（將軍）那裏獲得了寬大的特權”。<sup>②</sup>其中明確了英國人擁有自由停靠港口、公平買賣、遭遇海難時可以得到救助、保障英荷人的財產權利、保證英荷商人的人身安全、獨立的司法審判權等等。<sup>③</sup>不僅如此，英國人亞當斯還取得了德川家康的青睞，“我（亞當斯）如此般令他心悅，以致於他不會反駁我所說之事”，進而他在日本社會取得了西人從未有過的地位與尊榮。<sup>④</sup>最高統治者的開放姿態與友好態度以及這些御賜的權利，不僅僅是因為英荷的來航通商是西葡商業力量的有機補充，而且他們也被視為西葡的競爭對手，未來可以有效削弱西葡在日的傳統勢力，從而使得日本與西葡的貿易關係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其他關係能夠產生有利於日本本國的變化，使日本能夠享受更多由這種競爭性而非壟斷性的對外關係所帶來的福利和好處。幕府的這番“喜新厭舊”的政策變動從根本上不是為了去迎合英荷的利益訴求，而是為了服務於幕府自身的根本利益。扶持英荷的勢力是為了打擊西葡而使得市場能夠朝着有利於日本本國的方向發展，使得國內的整體局勢能夠朝着統一穩定的方向變化，而並不是為了純粹找一個西葡的替代物。最終荷蘭人能在四國爭雄當中突出重圍，一方面由於其恭順謙卑的態度贏得了幕府的垂青，畢竟，幕府統治者真正想要的是1641年之後被嚴格限制在出島且俯首貼耳的荷蘭那樣的貿易對象，所有都處在幕府的操控之下，牢牢地掌握着主動權。另一方面，荷蘭更勝一籌的“文治武功”也使得幕府相信通過荷蘭人在海外的經營來鉗制住可能會伺機反撲的西葡勢力，以此在國內就可以嚴防死守隨時會死灰復燃的敵對力量。從南亞到東南亞再到東亞，荷蘭商船穿梭其中，周而復始，“荷蘭人在蘇拉特、科羅曼德爾沿海和孟加拉大量收購質地不等的各種印度織物。他們用這些織物在蘇門答臘換取胡椒、黃金、樟腦；他們在暹羅出售科羅曼德爾的布匹……他們出售香料、胡椒和珊瑚，帶走專門為他們生產的錫……他們還從暹羅帶走為數可觀的鹿皮（在日本的賣價很高），一些象牙和黃金。帝汶的商站因經營不善而有虧損，但島上得到的檀香木在中國和孟加拉十分暢銷。至於孟加拉，該地區提供蠶絲、大米和許多硝石，後者與日本的銅和不同產地供應的糖一起，是返航歐洲時最好的壓艙貨”。<sup>⑤</sup>而這暢通的商道和交易網是倚仗荷蘭東印度公司強大的軍事實力。武力的使用幾乎貫穿了從荷蘭港口到亞洲商站的整個航程當中，融入到了從與歐洲人到與當地人交涉的整個情景之中，以及滲透到從

<sup>①</sup> Rundall, Thomas, editor.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5.

<sup>②</sup> (英) 約翰·塞里斯 (John Saris)；(日) 村川堅固、尾崎義記：《塞里斯日本渡航記》，東京：雄松堂，1999年，頁230。

<sup>③</sup> (日) 村上直次郎譯註：《增訂異國日記抄（異國叢書第1卷）》，東京：雄松堂，2005年，頁185—187；(英) 約翰·塞里斯 (John Saris)；(日) 村川堅固、尾崎義記：《塞里斯日本渡航記》，東京：雄松堂，1999年，頁375—376；Massarella, Derek, Izumi K. Tytler. “The Japonian Charters: The English and Dutch Shuinjō.”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45, no. 2, 1990, pp. 197-198.

<sup>④</sup> Rundall, Thomas, editor.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8.

<sup>⑤</sup> (法) 費爾南·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顧良、施康強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世界的時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263—264。

商品的栽種生產到銷售的整個流程裏面。荷蘭東印度公司意圖打破葡萄牙在亞洲所建立的秩序並逐漸取而代之的破舊立新的過程是必然得依靠軍事實力作為堅強後盾的。“葡萄牙人只是半理智地使用暴力，因為他們不僅在乎利潤，也同樣熱衷於宗教傳播和榮光。然而，荷蘭人卻是理智地使用暴力從而持續追求利潤”。<sup>①</sup>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擁有的軍事實力甚至強大到可以充當其母國海軍的地步，正是這股不可小覷的海軍力量“不僅逼迫着伊比利亞帝國在東方的勢力，而且迫使西班牙與荷蘭協商停戰並最終簽署了永久和平的協議”。<sup>②</sup>荷蘭在亞洲的戰略不僅令英國人難以望其項背而只能在印度以東採取全面收縮的策略，從日本的悄然離去也是其中一環；而且還讓西葡勢力對其心生畏懼，無法應對後來者的挑戰，以至於老牌帝國尤其是葡萄牙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勢力不斷地被蠶食，最終崩塌和瓦解。因此，幕府疏離於西葡而傾向於英荷，最終以荷蘭取代了葡萄牙，不僅是動心於後來者“只經商、不傳教”的原則，也是基於後來者尤其是荷蘭人的態度與實力，既能服膺於幕府的管制，又能遏阻西葡的勢力。

儘管在對外關係當中，幕府選擇了順從的荷蘭人以取代傲慢的葡萄牙人，然而幕府的整體政策卻是越發走向了保守，也正是在這種保守化的宏觀環境之下，西葡人遭到驅逐，英國人敗退而去，荷蘭人蜷縮於西南一隅。倘若豐臣秀吉從 1592 年確立、此後又被德川家康繼承的朱印船貿易制度既有管控也有發展對外貿易的保守性和開放性雙重性質的話，那麼從 1604 年開始實施的“絲割符制度”則是日本越來越趨向於保守性和內向型的經濟政策和政治走勢的序幕，顯示了幕府打壓葡萄牙商業勢力的決心。由於葡萄牙的強勢地位而造成了日本市場上絲價高漲秩序紊亂，使得日本商人處於被動和劣勢地位，而損害了日本方面的利益。為了扭轉這種對日不利的局勢，1604 年德川家康開始對葡萄牙在日商業活動進行限制而出台“絲割符制度”，德川幕府賦予了作為幕府代表的特許大商人與葡方商定價格甚至確定價格的主動權力，以此來爭奪對葡貿易的更多利潤，“黑船着岸之時，年寄未定絲值以前，諸商人不可入長崎，絲值商定後，萬望次第可致商賣者也”。<sup>③</sup>另一方面，對新來者英荷則是採取了兩面性政策，表面上賦予了他們自由買賣的權利，然而在現實的交易中又盡可能利用各種方式來壓價，或者給交易附上特殊條件，導致英荷實際上的不盈利甚至虧損，英國在 1623 年的早早退出與此不無相關。1616 年之後還將英荷西葡限制於平戶和長崎兩地，限制他們的商業活動自由。而進入到 17 世紀 30 年代之後本來是針對葡萄牙一國的“絲割符制度”不斷擴大，荷蘭商船也被幕府納入到了體制當中，強制他們將一定比例的商品尤其是生絲按照業已指定的價格銷售給特權商人，再由他們分銷至日本各

<sup>①</sup> Andrade, Tonio.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Global History: A Historiographical Reconnaissance.” *The Dutch and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ies: Diplomacy, Trade and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Asia*, edited by Adam Clulow and Tristan Mostert,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47.

<sup>②</sup> Adams, Julia. “Principals and Agents, Colonialists and Company Men: The Decay of Colonial Control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1, 1996, p. 17.

<sup>③</sup> 〈十人之者御奉書を得る事〉條，國書刊行會編：《絲亂記》（德川時代商業叢書 第一）卷一，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 年，頁 11；轉引自劉欽：〈日英早期通商研究（1613—1623）〉，博士論文，吉林大學，2018 年，頁 16。

地。<sup>①</sup>當荷蘭人在抱怨長崎奉行的不公正商業行為的時候（1630），就被明確告知，奉行等日本官員的職責自然是為了保護日本本國人的利益，這自然是凌駕於外國人利益之上的，因此“讓渡更多的利益給予荷蘭人就等於是在減少或者侵蝕日本人的利益，無論誰支持或者袒護前者就意味着傷害後者”。<sup>②</sup>1639年長崎官商又進一步施壓讓幕府強令在平戶的荷蘭商館遷移至長崎，以填補葡船離去之後所留下的真空。在幕府越來越趨於保守的政策走向和國內氛圍當中，日本的“金銀本位主義者”（bullionist）為了遏制白銀的不斷流失，還進一步提出了“進口取代”（import substitution），“德川的金銀本位主義對於輸出各種金屬的否定態度是與歐洲人一樣的，但是卻在一個重要方面上截然不同。歐洲國家試圖通過擴展貿易關係來維持甚至增加稀有金屬的儲量。相反的是，德川幕府的思想家們卻建議即使不是取消，至少也得減少對外貿易，並鼓勵國內生產來取而代之”。<sup>③</sup>通過發展國內相關的手工業來代替來自於外國的進口產品，從而擺脫以往對於外部世界的依賴，在這種“進口取代”的呼聲中以及幕府對於節儉作風的宣導下，日本的鎖國政策也在逐漸孕育成型。

儘管德川家康的對外政策是建立在務實的基礎之上，吸引他國船隻來航日本進行交易，從而獲取對外貿易的紅利，然而這種開放、自由以及和平的態度卻是在與其前任豐臣秀吉的擴張、武力和強權的對外政策相比較而凸顯出來的。素來標榜追求和平外交和自由貿易的德川家康，一方面嘉獎國民從事海外貿易，另一方面不斷地遞出橄欖枝招徠外人來日通商，他最初正是以此內外相結合的方式來奠定德川幕府的基礎並且蓄養國力。倘若仔細觀察，即便是家康相對外向型的對外政策當中仍然蘊藏着某種保守型的性格，而其政策當中的保守性格被其繼任者更加鮮明地演繹出來了。德川家康的開放性對外政策當中的保守性在某種程度上是緣於一種謹慎的態度，而這又是鑑於豐臣秀吉全面擴張性對外政策的失敗而不得不做出的調整甚至是一種逆向而行。“德川氏得天下頗有偶然因素，一大緣由即是豐臣秀吉將戰火引向海外，直接促成其子接受一副爛攤子，政權千瘡百孔、內外交困；殷鑑不遠，德川氏在處理海外事務之時極為謹慎，故此家康身後的鎖國傾向愈發明顯”。<sup>④</sup>豐臣秀吉選擇以戰爭的方式企圖建立與周邊諸國的不平等隸屬關係，德川家康則堅持和平貿易的方式保持往來；秀吉在一統日本之後走上了一種內政全面為軍事擴張服務的道路，而家康則傾向於以對外的貿易關係來鞏固和加強其初生的政權；前者將日本戰國時代群雄逐鹿的戰火引向海外，而後者則杜絕一切海外的紛爭燃燒至本土之上。因而，為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奠定基調的德川家康將保守性與外向型相融合，外向於表，保守於內。家康的保守性是以一種被動和消極的方式展現出來，這體現在其對外事務當中所持有的中立態

<sup>①</sup>（日）永積洋子：《平戶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三輯）——自一六三三年九月至一六三七年十月》，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4。

<sup>②</sup>Boxer, C.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372.

<sup>③</sup>Lee, John. "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 Asia, c. 1500 - c. 1800: East Asia in the Age of Global Integra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1, 1999, p. 9.

<sup>④</sup>王煜焜：〈博弈與犧牲：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點〉，《海交史研究》（泉州），第1期（2018），頁86。

度，堅持不介入海外子民與他國的紛爭當中，“強調與海外的日本商人斬斷關係，並且堅持所有違法者應當被置於所在國的司法體制下進行懲處”。<sup>①</sup>另一方面，這種保守性則是以主動和積極的姿態呈現出來，體現在與西方勢力競爭和對抗當中。在經濟領域是以“絲割符制度”來分享來航葡船貿易的利潤從而取代了過往的自由貿易，以朱印船制度來參與甚至爭奪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從而，幕府作為日本最高權威在國內和國外兩方面進行強制性調整，將西方的對日貿易向着日本的對外貿易扭轉，使日本從一個參與者和配角轉變成競爭者和主角。從 1616 年開始將西方國家的勢力限制在平戶和長崎兩地，1635 年將來自於中國的唐船也限定在長崎一地貿易，最後 1636 年和 1639 年先後把葡人和荷蘭人變相拘禁在長崎外的小島出島之上，也可謂是一種幕府積極介入的壓制性舉措。正如 17 世紀末到達過日本的探險家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所言，荷蘭人從此前一直在一個“仁厚且寬容”的大名（平戶的松浦氏）護佑之下，到此後被置於長崎政府的“森嚴且苛刻”的管制之下，“（荷蘭人）被當做帝國的叛徒和公開的敵人”，成為這個國度永遠的外來者和他者而與本土社會相分離與割裂。<sup>②</sup>在宗教信仰領域，德川家康的寬容態度在其晚年也變得越發保守，從而開啟了德川幕府時期鎮壓基督教的序幕。來日的傳教士被塑造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侵略先鋒”，除了日本佛教徒的攻伐、日本民間社會的渲染，更重要的是，“統治者不過是借外人發揮，作為‘侵略先鋒’的傳教士，其形象並非自己行為所能定義、乃是新政權為鞏固自身而塑造、豐富的敵人意象”。<sup>③</sup>無論是之前的豐臣秀吉還是後來的德川家康，都在潛移默化地固化傳教士這種“侵略先鋒”的形象和深化基督教作為“邪教”的認識，從而反襯出豐臣秀吉作為“豐國大明神”、德川家康作為“東照大權現”自我神化的形象，進一步奠定日本作為“神國”的地位，從而加速日本從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促進政權穩定。德川幕府以日本傳統的佛教和神道教來對抗西洋舶來的基督教，從 1612 年頒佈了天領的禁教令，到 1613 年末將其推廣至整個日本，再到 1614 年將高山右近、內藤如安等四百餘人流放驅逐至馬尼拉和澳門。繼任者德川秀忠和家光兩代將軍則是變本加厲地在全國鎮壓天主教，不僅繼續驅逐傳教士，而且以威逼利誘甚至是花樣迭出的酷刑來逼迫日本信徒轉教、棄教，直到為了斬草除根而選擇封鎖整個國家。這種宗教政策的保守性轉向直接導致了日本與西方四國的關係出現了巨大的變化，西葡之間的決裂，以及與英荷之間的調整。整體而言，作為繼任者的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將德川家康對外政策的保守性進一步延續、繼承和弘揚，而開放性在繼任者的執政時期則進一步被壓縮、削減，直至到“鎖國令”中幾乎絕跡。

西葡之所以不適合日本是在於其老牌殖民主義帝國的作風與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日本國已經開始格格不入了，那種曾經在日建立的商業霸權和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憂慮和矛盾令幕

<sup>①</sup> Clulow, Adam. “Like Lambs in Japan and Devils outside Their Land: Diplomacy, Violence, and Japanese Merchants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4, no. 2, 2013, p. 337.

<sup>②</sup> Rundall, Thomas, editor. *Memorials of the Empire of Japon in the XVI and XVII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XXIII.

<sup>③</sup> 喻樂：〈“侵略先鋒”：近世在日傳教士的形象塑造〉，《世界宗教文化》（北京），第 4 期（2019），頁 59。

府惴惴不安而勢必要將其消解和破除。英荷的後來居上並最後將西葡取代是幕府積極助推的結果。從本質上而言，這是一種在外交關係上的重新洗牌，英荷對於幕府的順從姿態相比於其能夠為日本所帶來的貿易量更具有重要意義，畢竟荷蘭的貿易體量在一時之間無法與葡萄牙相媲美，而且幕府還對於此後荷蘭商船的來航數量以及貿易規模也進行了嚴格限制。在四國的爭雄當中，日本統治者並不是處於一種被動的位置，而是積極參與並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這場變局。處在強勢地位的幕府主動地規範西人與日本的關係，從而使對外關係全面為內政服務，以維持其政權的穩定；然而兩個世紀之後的幕末階段，幕府面對歐美各國的堅船利炮而不得被迫扭轉其堅守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打開國門。本已日落西山而不得人心的德川幕府在西人面前的軟弱行徑，則引發了由西南藩主導的“尊王攘夷”的倒幕行動，而致使其統治根基崩塌陷落。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李文娟〕